

魏晋南北朝文人论屈原与楚辞

李大明

魏晋南北朝时期，《楚辞》训解、音义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新的成果。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文人在屈原思想行为的评价、《楚辞》文学特征和文学意义的探索上，也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意见，构成了该时期《楚辞》研究的重要内容。寻其大端，一方面是继承汉代《楚辞》评论，另一方面又在新的文化思想背景下有了新的发挥，如对《楚辞》文学特征、《楚辞》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多有创见，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一)

这一时期的不少文人对屈原的不幸遭遇还是很同情的。屈原以彼之才而不见容于君，这一悲剧震撼了后世有同情心的正直文人，虽然他们未必完全认识屈原悲剧的深刻意义。

西晋文学家陆云尝作《九愍》以拟《楚辞·九章》。其《序》云：

昔屈原放逐，而《离骚》之辞兴。自今及古，文雅之士莫不以其情而玩其辞而表意焉。遂厕作者之末而述《九愍》。

《九愍》依《九章》拟题命意，分《修身》、《涉江》、《悲郢》、《纾思》、《行吟》、《考老》、《感逝》、《□征》、《□□》诸章^①。其八《□征》云：

嗟有生之必死，固逸我以自休。彼达人之遗物，甘褰裳而赴流。矧余情之沉毒，资有生之速忧。悼居世其何蹙，固形存在为尤。想百年之促期，悲乐少而难多。修与短其足紊，曷久沉于汨罗。投澜漪而负石，涉清湘以怀沙^②。临恒流而自坠，蒙濬壑之隆波。

这段伤悼之文，虽然带着些仙意（屈原的《远游》亦有仙意）和玄意，但其基本倾向是对屈原沉江深表同情。

西晋时还有一位文人叫曹摅（事见《晋书·良吏传》），作《述志赋》以悲屈原之无辜（《艺文类聚》卷二十六）；东晋时的谢万有《八贤颂》之作，其中《屈原颂》称：“皎皎屈原，玉莹冰鲜，舒采翡林，摘光虬川”（《初学记》卷十七），均表达了对屈原的同情。

刘宋时著名文学家颜延之作《祭屈原文》，“敬祭故楚三闾大夫屈君之灵”。文云：

兰薰而摧，玉缙而折^③。物忌坚芳，人讳明洁。曰若先生，逢辰之缺。温风急时，飞霜急节。羸、羊遘纷，昭、怀不端。谋折仪尚，贞蔑椒、兰。身绝郢阙，迹遍湘干。比物荃菈，连类龙鸾。声溢金石，志华日月。如彼树芳，实颖实发。望泪心歎，瞻罗思越。藉用可尘，昭忠难阙。

观此祭文大旨，是承袭刘安、王逸。（参拙文《论王逸对评价屈原不正确观点的批评》，《四川师大学报》1985年第4期）

后来梁太子萧统编《文选》，这样评价屈原的人品和作品：

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诉。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④。

以上所列，是文人们对屈原同情赞美之词。较之汉代刘安、王逸和东晋郭璞等人的言论（郭璞的《楚辞》研究另文专论），虽无多大新意，但也充分说明了屈原的思想行为和作品对这一时期的深刻影响。

但是，由于时代的隔膜，由于生活态度的不同，也由于汉代一批文人用消极避世人生观指责屈原思想行为的错误评骚意见的影响，这一时期不少文人（即使如上述的对屈原表示了某种同情的一些人），并不真正理解屈原矢志自沉的思想意义；有的还指责屈原的言行，发表了不少偏颇失中的极端言论。

请略述如次。

三国时魏人李康，“性介立，不能和俗”（《文选》卷五十三李善注引《集林》语）。有《运命论》一篇，抒发不遭明主的愤懑。此论大意仿《论衡·逢遇》⑤。其文有云：“夫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这是用老庄思想看待社会和人生⑥。其论屈原行为曰：

而后之君子，区区于一主，叹息于一朝。屈原以之沉湘，贾谊以之发愤，不亦过乎？

所以他认为：“然则圣人所以圣者，盖在乎乐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那么，屈原当然就不是值得后人仰慕的圣人了。

又如前引西晋文人曹摅所作《述志赋》，对屈原的“无辜”表示了同情，但是从其赋所表达的总的思想倾向来看，仍是认为“嘉沮溺之隐约，羨接舆之狂歌”，因为“顾大雅之先智，纬明哲之所经”，宣扬的是明哲保身那一套处世哲学。

西晋还有一位文人叫挚虞，其论楚辞文学特征很有新意（详后），但他的人生哲学是“以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之所祐者顺也⑦，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顺，所以延福；违此而行，所以速祸”（《晋书》本传），所以有《思游赋》之作，“以明天任命之不可违”。故其作《愍骚》（《艺文类聚》卷五十六）云：

盖明哲之处身，固度时以进退。泰则摅志于宇宙，否则澄神于幽昧。摘之莫究其外，函之罔识其内。顺阴阳以潜跃，岂凝滞乎一概？

这番议论，与班彪《悼离骚》所宣扬的穷达由命的惨观点如同一辙⑧。

本文前引谢万作《屈原颂》，称赞屈原“玉莹冰鲜”。而据《世说新语·文学》：“谢万作《八贤论》。”刘孝标注：“万集载其叙四隐四显，为八贤之论，谓渔父、屈原、主、贾谊、楚老、龚胜、孙登、稽康也。其旨以处者为优，出者为劣。”这说明，在谢万看来，处者如渔父比出世者屈原为优。谢万之旨，仍在宣扬避世之道。

当然，以上这些文人对屈原思想行为的评论，还主要表现为不理解。而北齐时学者颜之推则直承班固，指责起屈原的思想行为了。《颜氏家训·文章》云：

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

以下，颜氏又列宋玉、东方朔、司马相如以至齐梁间诸多文人而指责之。案颜氏说“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固然是对魏晋以来一些文人无行恶迹的有感而发；但以此批评屈原，则很不妥当。至于说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则是直抄班固《离骚序》所谓“今若屈原，露才扬己”，“责数怀王”等语而发挥之。今观颜氏的文学思想，是很正统和保守的。他认

为“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行有余力，则可习之。”原来，文章之用要“从容讽谏”，而屈原“轻薄”，“露才扬己，显暴君过”，所以不是“从容讽谏”。他又说：“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这是说“轻薄”文人“忽于持操，果于进取”正如罔两之批评景无持操（参《庄子·齐物论》），又进取于道，知进而不知退（参《论语·子路》邢疏），所以，“讽刺之祸，速乎风尘”，要求文人“深宜防虑，以保元吉”（以上引文俱《文章》）。

由以上引述可知颜氏的处世哲学就是明哲保身之道。颜氏一生历仕梁、北齐、北周而入隋。世事险恶，使他深悟世故，从忧患中得出了安身保命的经验。如《颜氏家训·勉学》说：

“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当自求诸身。”《养生》说：“夫耳养生者先须虑祸，全身保性”；又说：“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险畏之途，干祸难之事，贪欲以伤生，谗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这番议论有些口是心非，因为他对屈原的诚孝仁义行为不赞扬；对屈原的涉险畏、干祸难之事也不惋惜，反而攻击他“露才扬己”、“轻薄”，这是很不公正的⑩。

以上略说魏晋南北朝文人对屈原思想行为的评价。同情赞美者有之，指斥责怪者亦有之。至于魏人刘献之骂屈原为狂人，“死其宜也，何足惜也”（《魏书·儒林》传），此又近乎蜀犬吠日了。

（二）

比较而言，魏晋南北朝文人对《楚辞》的评价，尤有价值。因为众所周知，这一时期的文学观念比汉代来说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嬗变，文人们开始有了比较自觉的文学意识。所以他们论《楚辞》，比较注重其文学特征了。

当然，这也有一个比较地不自觉地到比较自觉的过程。汉代文人的文学观念，汉代文人评《楚辞》的一些成说，对他们仍有较大的影响。例如较早的曹丕在《典论·论文》中云：

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曰：优游案衍，屈原之尚也；穷侈极妙，相如之也。然原据托譬喻，其意周旋，绰有余度矣。长卿、子云，意未能及已。（《北堂书钞》卷一百引）

这段话是模仿杨雄。《文选·谢灵运传论》李善注引《法言》云：“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曰：原也过以浮，如也过以虚。过浮者蹈云天，过虚者华无根。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鸟兽，其著意，子云、长卿亮不可及。”⑪我们将这两段作一比较是很有意义的。从两段话语法结构看，曹丕完全是模仿杨雄；而从两段话的内容看，杨雄着眼于屈原和司马相如赋的内容的比较，而曹丕则似乎更注意二人赋的文学特征的比较——我们从中不是可以体会到由汉而魏的文学观念的某种演变之迹吗？

西晋皇甫谧撰《三都赋序》，其论屈原之赋，大要同于杨雄《法言·吾子》、班固《汉书·艺文志》。而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论屈原及《楚辞》，在继承汉儒评说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挥。

据《晋书·挚虞传》，虞撰《文章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其论《楚辞》，类书有引，可得其大略。《艺文类聚》卷五十六引：“古之作诗者，发乎情，

此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之指，须事以明之。故有赋焉，所以假家尽辞，敷陈其志。”这儿讲赋的产生，用的是汉人诗说⑥。《太平御览》卷五八七又引：“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屈原，尚颇有古之诗义。至宋玉则多淫淫之病矣。《楚词》之赋，赋之善者也。故杨子称赋莫深于《离骚》。贾谊之作，则屈原之侍也。”这也是对汉人说法的引伸。下一段引文颇有新意，《艺文类聚》卷五十六引：

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富而辞无常。文之烦省、辞之险易，盖由于此。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辨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是以司马迁割相如之浮说，杨雄疾“辞人之赋丽以淫”。

根据挚虞所论，他认为荀卿、屈原（还包括贾谊——他大概是楚辞文学传统的杰出继承人）之赋，是以情义为主的，而不是以事类为主。而何谓“事类”？《文心雕龙·事类》云：“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地。”挚虞又批评以“事形为体”的所谓“今之赋”，“言富而辞无常”，有四个方面的过失。那么屈赋呢？就当然是假象不过大，逸辞不过壮，辨言不过理，丽靡不过美，所以既符合情义，又不失事理。挚虞所论，至少可以说是对汉人评骚理论的具体发挥。有政治的评价，更有文学的评价。

到了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里，对《楚辞》以及屈原辞赋的艺术价值及其对后代文学的影响，又作了十分精彩的评论。其文云：

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自兹以降，情志愈广。王褒、刘向、扬、班、崔、蔡之徒，异轨同奔，递相师祖。虽清辞丽曲时发乎篇，而芜音累气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艳发，文以情变，绝唱高踪，久无嗣响……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原其飘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

案沈约之义，屈原辞赋开创了周诗之后文学的新天地，其英辞高义影响了整个后代（不仅仅是汉代，也包括了魏晋以后）的文学。他说一世之士“莫不同祖风、骚”，正是着眼于屈赋的崇高地位和深远影响。他的这一独具只眼的史家眼光，在唐代史学家那里得到了强烈反响（参拙文《唐代文人论楚辞》所论）⑩。

至于梁代的钟嵘作《诗品》，论诗的源流，提出了五言诗滥觞于《离骚》（也包括《夏歌》）的观点。这一意见值得注意，因为它说明钟嵘用的是文学史家的眼光看待屈赋对后代文学形式上的影响，尤需指出的是，钟嵘更从文学精神和文学传统继承的角度去深入考察五言诗的源流。《诗品序》云：

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嫠妇泪尽；或士有鲜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

所以他评论李陵之诗有云：

其源出于《楚辞》。文多凄怆，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诗品》卷上）

根据上引《诗品序》可以看出，钟嵘认为李陵诗源于《楚辞》，主旨在一“怨”字。西汉刘安作《离骚传》曾指出：“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不怨乎？”而钟嵘用“怨”在概括《楚辞》文学精神及其优秀传统，确实是很深刻的。而他批评“自王、杨、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也是着眼于王褒、杨雄、枚乘、司

马相如等人的辞赋少了“怨”义。他又论汉婕妤班姬诗、魏侍中王粲诗、晋黄门郎张协诗、魏文帝曹丕诗等出于李陵。他认为班婕妤之诗“怨深文绮”，王粲诗“发愀怆之词”等等，我们可以由此悟出他对《楚辞》文学精神的基本评价。

(三)

以上我们讨论了六朝文人对《楚辞》的评价。而梁代著名文论家刘勰在体大精深的《文心雕龙》一书中对屈原、特别是《楚辞》的产生、《楚辞》的文学意义等更是作了十分精彩的论述，故辟本节加以讨论。

刘勰论文，宗经尊圣，但他也看到了《楚辞》不朽的文学价值。他能从文学发展的角度充分肯定楚辞产生的历史意义，这正是他比前人高明卓异的地方。

《文心雕龙·序志》（下引该书，只注篇名）云：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

刘勰认为，文学是发展变化的，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序》）。而屈原（还有宋玉）辞赋正是战国时代特殊文化背景的产物。所以他指出：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春秋以后，角战英雄，六经泥蟠，百家飘骇。方是时也，韩、魏力政，燕、赵任权，五蠹六虱，严于秦令。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齐王庄衢之第，楚广兰台之宫，孟轲宾馆，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邹子以谈天飞誉，驺大以雕龙驰响；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之炜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

《辨骚》也指出：

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

这也是着眼于《楚辞》产生的社会文化原因。

基于文章之学“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的理论框架，刘勰着力探讨了如何“变乎骚”这一新鲜课题。《宗经》认为：

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

那么屈赋呢？刘勰认为，有符合上述“宗经”之义的地方，也有不符合的地方。其符合“宗经”之处，《辨骚》指出：

其陈尧舜之歌介，称禹汤之祗敬，典诰之体也^⑮；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浞之颠隕，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霓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之也。观兹四者，同于风雅者也。

刘勰认为上述这四个方面“同于风雅”，也就是符合经义，这不叫“变”。其《比兴》篇说：“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风兼比兴。”^⑯《通变》也说：“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明诗》也说：“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都指出并肯定了屈赋上述符合经义的文学精神。

刘勰认为的“变”是如下四个方面：

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娥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弊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

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摘此四者，异乎经典者也。

这四个方面，涉及内面，也涉及形式。所谓“诡异之辞”，当然不符合“情深而不诡”的要求；“譎怪之谈”，也不符合“事信而不诞”之义；“狷狭之志”和“荒淫之意”，也有悖于“义直而不回”之道。总之，这四者皆“异乎经典”六义。所以刘勰进一步指出：

故论其典故则如彼，语其夸诞则如此。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辨》，绮靡以伤情；《远游》《天向》，瑰诡而慧巧；《招魂》耀艳而深华；《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往之才。故能气往辄古，辞来《大招》，切今，惊采艳绝，难与并能矣⑥。

在这段评论里，刘勰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从四同四异分析可知，楚辞在体制上学习了三代之典籍，所以有四个方面“同于风雅”；但又夹杂了战国时代的夸诞之风，这才产生了“异乎经典”的特殊文风。第二，正因为如此，楚辞不是雅颂的正统继承者，却是辞赋的杰出开创者，虽也取熔经意，但在立意、遣词等方面都“自铸伟辞”，压倒古人，启迪后人。第三，也正因为“自铸伟辞”，所以屈赋的志、情等才独具特色，“惊采艳绝”。

这，就是所谓“变乎骚”的实质内容。

刘勰的论述很有见地。因为，如果用经义去看屈赋，固然有相同的地方（除了刘勰所列，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但是，如果从文学发展变化的角度来看，战国时楚国之所以产生楚辞，就不尽是《诗》、《书》等经典文献（或曰儒学文化）在起作用。换言之，由于楚辞产生于战国时代特殊的文化背景之中，它就当然有异乎商周时代文化的个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风杂于战国”，恐怕还有“不有屈原，岂见《离骚》”（《辨骚·赞》），“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物色》）等因素。

还需进一步指出，对于楚辞之“异乎经典”，特别是辞采即文学语言上的“异乎经典”，刘勰虽然说了很多称颂的话，但这主要是从文学发展变迁的角度对楚辞产生的一种认可。而从宗经六义的角度来看，他还说了不少批评性的话，显得相当保守和正统。如《宗经》在阐述六义之后又说：

文以行立，行以文传。四教所先，符采相济。迈德树声⑦，莫不师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未归本，不其懿欤？

这是说，作文要依据孔子定立的“四教”（文、行、忠、信。见《论语·述而》）。但是文章的言辞却很不容易做到宗经，楚辞汉赋浮艳侈靡，才产生了流弊。《通变》将“楚汉侈而艳”与“商用丽而雅”对举，也是这层意思。在《文心雕龙》里，这一类的言论还很多。如《事类》云：“观夫屈宋属篇，号依诗人。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定势》亦云：“是以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究其原因，《离骚》之辞本来就“异乎经典”，所以后世学习楚辞，就归之“艳逸之华”了。这也就是《辨骚》里所说的“才高者苑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酌奇而失其贞，玩华而坠其实了。

正因为如此，刘勰虽然每每“屈宋”连称，但对二人还是有区分的。《诠赋》说：“宋发夸谈⑧，实始淫丽。”这是用扬雄“辞人之赋丽以淫”的话批评宋玉。也正因为如此，他对汉楚辞作家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批评。《辨骚》云：

自《九怀》以下，遽蹶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

他指出，汉人从王褒《九怀》以下^③，不能真正继承屈宋辞赋的文学精神。这就是《比兴》所说的“炎汉虽盛，而辞人夸毗，讽刺道丧，故兴义销亡”^⑩；也就是《才略》所说的“相如好书，师范屈宋；洞入夸艳，致名辞宗。然核取精意^⑫，理不胜辞。故杨子云以为‘文丽用寡者长卿’，诚哉是言也”。而《哀吊》又云：“自贾谊浮湘，发愤吊屈，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杨雄吊屈，思积功寡。”刘勰又将杨雄批评相如的话回敬给子云自己了。

综上所述，刘勰论楚辞，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这些意见，有的是继承前人成说，而有新的发挥；更多的则是刘勰的独创。特别是他能从文学发展变化的角度论骚，强调并深入探讨了楚辞的文学特征。这些论点，不但比汉代文人的评骚意见高明，也超出了六朝众多文人的认识水平。虽然宗经尊圣的理论模式束缚了他，但他能够从文学实际出发，高度肯定和精辟论述楚辞的文学精神和文学意义，这一点，无论怎样讲都是难能可贵的。

注 释：

①《□征》，“征”前字脱。其九题盖拟《九章·悲回风》，宋刊《陆云集》误认题在篇首，因删去末一行，今无从校补。参严可均辑《全晋文》卷一百一校语。

②陆云认为《九章·怀沙》是绝命词，故言。在陆云以前，汉司马迁、王逸、蔡邕等皆主此说。东晋郭璞始以《悲回风》为绝命词。说参汤炳正先生《〈九章〉时地管见》、《关于〈九章〉后四篇真伪的几个问题》二文。

③此抄《文选》卷六〇之文。《宋书》本传“缜”作“贞”。

④《文选·序》。

⑤《文心雕龙·论说》云：“李康《运命》，同《论衡》而过之。”

⑥关于这个问题，拙文《论王逸对评价屈原不正确观点的批评》有论，可参。

⑦《晋书》本传“顺”作“义”而《通志》卷一二四上引作“顺”。依下文“履信思顺”来看，作“顺”义畅，故校改。

⑧班彪之文曰：“夫华植之有零茂，故阴阳之度也。圣哲之有穷达，亦命之故也。惟达人进止得时，引则遂伸，否则拙而折螭，体龙蛇以幽潜。”见《艺文类聚》卷五十六。

⑨颜氏晚作《观我生赋》，对一生出处进退作了总结。文在《北齐书·文苑传》本传，可参。

⑩今本《法言》无此文。又疑“子云”二字误衍。

⑪见《诗大序》。

⑫参《北齐书·文苑传序》、《周书·王褒庾信传论》、《隋书·经籍志·集部序》。

⑬“禹汤”，旧本作“汤武”，唐写本作“禹汤”。案《离骚》、《九章·怀沙》三言“汤禹”，当据以是正。此屈赋倒置之修辞格，说详汤炳正先生《屈赋修辞举隅》。

⑭“风”，旧本作“讽”。据范文澜先生《文心雕龙注》校改。

⑮此段引文，“体宪”旧作“体慢”、“风杂”作“风雅”、“慧巧”作“惠巧”、“大招”作“招隐”，今据唐写本改，参范文澜先生《文心雕龙注》。

⑯“迈德”原作“励德”，据唐本改。

⑰“夸谈”原作“巧谈”，据唐本改。

⑱《楚辞》旧本《九怀》在第十一（《楚辞释文》旧篇次），其下有东方朔《七谏》、刘向《九叹》、庄忌《哀时命》、王逸《九思》等，故刘勰如是言。今本《九怀》在第十五，其下仅刘向、王逸二赋。

⑲“讽刺”原作“诗刺”，据范文澜先生校改。

⑳“核”原作“覆”，据范文澜先生校改。